

# 闲暇时间与人的全面发展

李 迎 生

本文对闲暇时间的概念定义提出了独自的看法，认为闲暇时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自由时间是一个比闲暇时间更为宽泛的概念，而闲暇时间是同工作时间相对而存在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闲暇时间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促进社会的进步。基于此种认识，作者对闲暇时间及其变化趋势、它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以及社会及个人于此应具有哪些准备、条件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作者：李迎生，196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讲师。

闲暇时间的利用问题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闲暇时间及其变化的趋势是什么？它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何在？以及为了实现闲暇时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社会及个人应当进行哪些方面的工作？等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点探讨。

—

闲暇时间是指在工作时间之外的、扣除了与工作相联系的时间（如上下班时间、班前准备时间）以及用于家务劳动时间和满足个人生理需要的时间之后的、真正由个人自由支配的那部分时间。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有人把闲暇时间等同于自由时间，其根据就是马克思曾说过闲暇时间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sup>①</sup>这样的话。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诚然，**闲暇时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可以自由支配，但决不能就此断定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闲暇时间，因为自由时间是一个比闲暇时间更为宽泛的概念。**闲暇时间之所以谓之“闲暇”，就在于它是同工作时间相对而存在的。并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闲暇时间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而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因此，它为社会所必需。而自由时间除包括闲暇时间外，还包括人们达到一定年龄失去工作能力退休后所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失业和待业的时间等等。后三种自由时间虽都具有“可以自由支配”这样一个特点，但它们并不是同工作时间相对而存在的，同工作时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失业及待业时间等是由于社会尚存在种种缺陷所造成的，是社会进步的副产品，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必须逐步加以消除的现象。因此，那种把闲暇时间等同于自由时间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闲暇时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社会生产力越发达，工作时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1页。

间就越少，闲暇时间就会越多。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上及其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生产时间及家务劳动时间等等的缩短，因而，从总体上看，闲暇时间必然呈现稳定增加的趋势。其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人们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提供了可能。其二，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成为可能。其三，当代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交通工具和设施的不断现代化，也使人们上下班路途往返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不断减少，从而有可能增加闲暇时间。

实际研究表明，原始社会人们的一生中的闲暇时间仅为整个生命时间的16.6%，而劳动时间占33.3%；前工业社会人们一生中的闲暇时间为22.9%，劳动时间为28.6%；而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一生中的闲暇时间为38.6%，劳动时间只占10.4%。<sup>①</sup>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引起了闲暇时间的不断增加。如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对该市职工的抽样调查，1982年北京市市职工人均每天闲暇时间为3小时30分，到1986年人均每天闲暇时间达3小时59分，4年内增加了29分钟。对其他城市职工的抽样调查结果同样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的闲暇时间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 二

闲暇时间的存在及其不断增加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曾经指出，增加闲暇时间，即是增加使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充分肯定了闲暇时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

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含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而且包含人的个性、才能和志趣的多方面发展以及思想道德境界的不断提高，等等。自古以来，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一直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所认真关注的一个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闲暇时间的存在及其不断增加便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马克思把闲暇时间看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广阔天地。他曾科学地预言，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将不是工作时间，而是闲暇时间。<sup>②</sup>在这里，马克思当然没有排斥工作时间内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在一种适宜于发挥人的个性与才能的工作岗位上，在工作时间内，一个人也可以使自己获得发展和提高。但是，由于工作时间一般来说具有一种“他人导向”，个人不得不遵从某种较为统一的模式，因此，个人在工作时间范围内所获得的发展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存在旧的分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迄今为止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为特征的旧的分工，破坏了人体内部的生态平衡，使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不得不以畸形片面的方式发展。就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物质劳动者来说，这种社会基本分工对他们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使他们从根本上失去了精神发展的基础，从而造成了他们体力上的畸形发展和精神上的无知、贫乏。就从事智力活动的精神劳动者来说，脑体分工对他们自身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则是使他们在精神文化素质获得提高的同时，身体机能和素质日渐萎缩。由于旧的分工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一种强制的社会存在，束缚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闲暇时间的存在及其稳定增加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便日渐突出了。闲

<sup>①</sup> 引自王雅林：《自由时间利用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1982.1

<sup>②</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

暇时间由于可以“自由支配”，人们从事什么活动具有完全的自主性，个人便可以在这种活动中更加充分地表现人的主体性及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社会，其发展、需求和活动的全面性，都是由节约时间来决定的”。只有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个人才能“获得应当具备的各方面的知识或者满足他的活动的各种要求”。<sup>①</sup>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人们工作与劳动的性质、内容、方式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在现阶段工作与劳动主要是人们用来谋生的手段，尚未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从事什么职业，也不能由个人自由选择，旧的分工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因而，工作时间对人的发展虽有有利的一面，又必然存在压抑和束缚的一面。而在闲暇时间内，人们可以充分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活动内容和方式，从而使自己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必要将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促进人们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不同领域。**

闲暇时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活动来实现的。根据人们在闲暇时间中所从事活动的内容和性质的不同，可以把闲暇时间中的活动分为“一般消遣性活动”与“较高级活动”两大类。这两类活动对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般消遣性活动”包括文艺欣赏，听广播，看电视、电影，开展体育活动，旅游观光，社会交往以及从事其他个人爱好活动等等。在这些活动中，人们不仅可以得到愉快的娱乐和休息，而且可以培养和发展人们丰富多样的兴趣和爱好，增加和扩大各方面的知识，提高审美能力，陶冶思想情操，增强体力和发展智力等等。具体说来，“一般消遣性活动”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人们增长见识，开扩眼界，更新思想方式。二是有利于改变人的个性的某些缺陷。在改革开放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个性的某些缺陷如封闭、保守、迟钝、呆板等个性品质在不少工作岗位上显然是难以适应的。要改变这些个性缺陷，在工作时间比较规范的活动范围内显然是难以实现的。而利用闲暇时间，开展各种轻松愉快的闲暇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的个性的某些缺陷。如通过此类活动的开展，使人的性格逐步由封闭保守型转变为外向开放型，形成热情、活泼、灵敏、迅速的气质等等，以适应当今社会改革开放对各类开拓型人才的需要。三是有利于培养和发挥人的多方面生活情趣和爱好，陶冶思想情操。利用闲暇时间，开展散步、练功、打球、下棋、滑冰、游泳等各类体育活动，可以使人们在工作中所消耗掉的体力和其他生理机能得到恢复、补充、增强和发展，提高身体素质。

在闲暇时间中从事各种较高级活动，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部分活动种类包括参加各种业余学习和自修，开展社会工作和从事社会活动，进行文艺创作、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等等。这类活动体现为人们对于精神需求的深化和提高。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各种业余学习和自修，学习各种文化科学和专业技术知识，有利于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技能。利用闲暇时间，从事科学研究、科技发明或文艺创作活动，有利于培养和发展人的正确、全面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其他各种创造性活动，有利于实现人的各方面才能的充分自由发展。利用闲暇时间，开展社会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有利于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等等。

实际上，在闲暇活动结构中，“一般消遣性活动”与“较高级活动”是很难截然分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的，而是相互包含和交叉，共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作用。只是由于个人之间差异的存在，上述两类活动在不同个人的闲暇活动结构中所占比重有所不同而已。

### 三

闲暇时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闲暇时间数量的多寡、社会可以提供人们在闲暇时间中利用的娱乐设施的数量和质量、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及人们对此的接受程度、人们的文化知识和从事各种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的闲暇活动的技能、闲暇时间的活动结构等等，都对人们能否利用闲暇时间实现全面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此，社会和个人都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并通过多方面途径，采取各种措施逐步加以解决。从社会方面来说，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增加供给人们使用的闲暇时间。根据对人们一天内时间支出的分类可以看出，要增加闲暇时间，必须减少人们对工作时间、上下班路途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等方面的支出。现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就是用缩短工作时间、上下班路途时间及家务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增加闲暇时间的。这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效率较高及社会现代化已经实现的情况下自然是可行的，但在尚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则难以实行。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劳动群众的闲暇时间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增加，有些城市（如北京市）职工的闲暇时间占有量已经达到或接近西方发达国家60年代中期水平。做到这一点已很不容易。虽然从理论上分析，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劳动时间将趋于缩短，闲暇时间趋于增加，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从实际情况来分析，要把职工的工作时间缩短哪怕一个小时，也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在大城市，要把职工上下班路途往返时间缩短10分钟也是困难的，减少家务劳动时间也受到生活社会化程度及家用生活设施现代化程度的制约。提出这一点，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现有的条件下增加闲暇时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社会对此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这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所享有的闲暇时间获得普遍增加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继续全面、深入地改革我国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生活社会化程度和家用生活设施电气化、自动化程度，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地区，在城市规划中做到将职工的工作区与生活区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及大力加强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如此等等，必然能够导致我国劳动群众所享有的闲暇时间的继续稳定增加。

(二) 大力发展供给人们使用的各种闲暇活动设施的建设。开展闲暇活动，要凭借一定的物质条件和设施。从事业余学习活动，需要提供各种学习场所，如开办业余大学、职工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等其他各级各类业余学习机构；需要提供图书馆、阅览室、报刊资料室等各种藏书机构；开展体育运动，需要提供运动场地和比赛场所，以及大量的体育运动器材；进行旅游观光，必须伴以风景名胜地的开发建设、城市公园、游乐场的建设以及旅游交通、服务设施的建设，如此等等。近几年的许多调查表明，我国闲暇活动设施的匮乏，是造成一些青年生活单调，无所事事，甚至成为个别青年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精神需求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否则两个文明建设就不能得到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将受到很大的影响。要大力发展提供人们闲暇时间利用的娱乐设施的建设，笔者

认为,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应当逐步加强对各种文化娱乐设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制定一系列的扶植措施,同时还要逐步解决一些与此相关的体制和政策上的问题。在当前国家财力和物力还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加快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可以广开渠道,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通过各种途径以求得较快的发展。

(三)不断强化共产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宣传和教育,把人们的闲暇活动引导到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轨道上来。闲暇时间是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人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受到一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制约。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人们选择闲暇活动方式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别。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把人的身心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目的,不利于人的身心发展的活动,是与之不相符合的,因此,接受了共产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们,能够比较自觉地把闲暇时间用于发展和提高自身素质上来。据王雅林同志对我国黑龙江省某些地区青年工人闲暇活动方式的调查,发现这些青工的闲暇活动方式可以划分为“创造型”、“求知型”、“娱乐型”、“空耗型”、“反文明型”五种类型,很明显,后两种类型是不利于或有害于人的身心发展的。近几年来,在我国执行改革开放的同时,由于没有抓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某些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腐朽的人生价值观念乘虚而入或沉渣泛起,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不少人开始把闲暇时间用于烧香、拜佛、算卦、占卜、赌博、卖淫宿娼等各种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活动上面,也已引起了我国党和政府以至于全社会的普遍重视,目前在全国广泛开展的“扫黄”及扫除“六害”的活动,就是为此而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上述状况表明,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应当不断强化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引导人们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不要虚度时光,不要去做无聊的甚至有害的事情;教育和引导人们养成文明生活的志向,能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各种较高级活动,培养人们的高尚情趣,使人们在身心各方面都获得健康自由的发展。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获得,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平、经验阅历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存在着时间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人们一旦最终获得了它,就必将对其选择有利于促进自身素质全面发展的闲暇活动方式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四)了解人们在闲暇时间使用结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指导人们对不利于自身素质全面发展的闲暇活动结构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一定的闲暇时间范围内,人们即便有了较高的思想觉悟,不致于从事有害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但是,由于人们从事各种闲暇活动所占的比重存在着差别,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也是不相同的。从大的方面来说,人们在一定的闲暇时间范围内,用于“一般消遣性活动”的时间与用于“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应当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科学规划。否则,如用于消遣娱乐性活动时间太多,则必然挤占了人们用于学习和探索方面的时间,从而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大量的调查数据来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一个闲暇活动结构不太合理的问题,表现在人们用于消遣娱乐性活动尤其是看电视的时间过多。在美国,男子每天看电视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以上。在法国,男子每天平均看电视大约为一个小时。<sup>①</sup>苏联莫斯科人看电视时间占全部闲暇时间的40—42% (1980年),其中男子每周16小时零27分钟,女子为10小时零9分钟。<sup>②</sup>我国北京市职工1986年人均每天看

①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学与时代》,第1卷,第310页。

② 宋林飞:《现代社会学》,第4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电视时间达1小时19分,其中男子1小时28分,女子1小时零8分。①天津市有的青年工人每天听广播、看电视时间达2小时24分,而每天用于业余学习或自修的时间平均仅1分钟。②电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带来了最新信息,但也明显挤掉了人们从事业余爱好和创造活动、读书学习等方面的时间,影响个人的全面发展。对于这样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重视。社会有关部门应当对劳动群众的闲暇活动结构进行经常性的深入调查和分析,根据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不同职业的劳动群众的特点,指导人们建立科学的并切实可行的闲暇活动结构,以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五) 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渡过闲暇时间、从事各种有意义的活动的本领。如上所述,在闲暇时间活动领域内,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人的身心发展的活动。这除了与人们在获得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在时间先后与程度高低上有所差别外,也与一些人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合理使用闲暇时间的必要才能有密切关系。当今不少人的闲暇时间活动结构中,用于消遣娱乐性方面的时间尤其是看电视的时间较多,而用于求知探索性活动时间较少,也与我国劳动群众文化素质还比较低、急待提高这一状况有关。从“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状况”课题组的有关调查结果看出,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工往往把闲暇时间用于学习活动,而文化素质较低的青工则较多地把闲暇时间用于娱乐消遣。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水平的青工,20%以上每天娱乐时间在1小时以下,却有近20%的每天学习时间在3小时以上。而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青工,大多每天娱乐时间在1小时以上,学习时间则在1小时以下。针对上述状况,社会有关部门或机构应当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多种办学形式逐步提高我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根据需要与可能,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培养人们开展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活动的技能。如可通过开办体育、旅游、影视鉴赏、唱歌、跳舞、书法、摄影、集邮、种花、养草……诸如此类的技能、技巧辅导班或辅导讲座,组织各种业余爱好者协会,发行有关闲暇活动的各种指导性书籍,以帮助人们学习和掌握从事闲暇活动的技能和技巧。

(六) 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树立科学利用闲暇时间的先进典型,制定闲暇时间活动条例,指导人们更为合理有效地利用闲暇时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第二届闲暇时间大会就曾提出了制定休息条例的建议,这是值得支持的。当然,闲暇时间是应该由个人自己决定其使用的时间,由于各人具体情况的不同,闲暇时间利用方式也有所差别。但如上所述,总是可以将人们的闲暇时间活动归入一定的结构中,合理的闲暇时间活动结构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这就为典型示范和制定闲暇时间活动条例提供了可能性。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等方面人们在闲暇时间利用方式上的不同特点,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而不能搞一刀切。

要使闲暇时间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现实的影响,除了社会方面应当做好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之外,还需个人作出不懈的努力,逐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和训练合理利用闲暇时间的必要技能,提高闲暇生活质量,调整闲暇活动结构,促进闲暇时间活动朝着有利于自身素质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1990年4月  
责任编辑:张宛丽

① 青连斌:《大城市职工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问题的初步研究》,《社会学研究》,1990.1.  
② 王玉波、王辉、潘允康:《生活方式》,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